

国企改革莫忘“制度自信”

■ 宋方敏

当下中国,“制度自信”已成为一个高频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一些专家、官员和地方推进国企改革的话语中,“制度自信”往往不见了,倒是西方企业管理制度模式,被尊为范本,大力推行。

制度自信要落实到做大做强做优国企

在世界格局变化、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诸多安全威胁凸显的大背景下,中国要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历史跨越,国企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引领经济升级和拼搏国际市场的主力军重任。中国国企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其经营效益水平和财政贡献水平,直接决定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社会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

试想,在改革中如果按照西方那种“修补匠”的国企模式,对我国应为“顶梁柱”的国企进行改造重构,只要“混改”让权让利,不要竞争控股做强,让国企主动退出一般竞争领域、只干“赔本买卖”,甚至以打破垄断名义,连国企金融等经济命脉和维系百姓基本生活的公益部门也让外资私资进来把控,那结果恐怕不是让国企做大做强做优做大,而是弱化、变质、退化,给国家带来私有化、庸俗化的悲剧性后果。

重视实体不能管国资不管国企

有一种流行说法,今后要用“国资”概念代替“国企”。理由是,这轮改革大多数国企要“混改”、产权多元化,原来全民意义上的国企就不存在了,国家也将由过去主要管“国企”变为管“国资”,只要资本运作有效益,企业怎样不用管也管不着了。这是一种令人担心的倾向。如果下面改变国企性质,上面放弃国企管理,两相呼应,整个国有经济岂不被搞空了?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只看资本增值数量,更要看资产实际质量,基础和关键在于实体经济。资本富国,不等于经济强国。只重资本价值形态,不顾实物形态,一国经济就成了建在虚拟世界的空中楼阁。中国是13亿多人口的大国,靠炒股票炒不出“中国梦”!在资本市场上,无论是让国资被人家玩于股掌,还是为了国资保值将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体经济抛之不顾,都是对国家人民不负责任。至于现在提“主要管国资”,应该理解为要从价值形态更有效地加强对企业经营发展方向和效益的管控,不能曲解和演变成今后国家不管国企、放弃国企。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制度自信”如果不落到企业微观制度基础上,那就成了空话。这些年国企改革暴露出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改制过程中生搬硬套、食洋不化、机制脱节带来的制度性漏洞。一些国企引入西方公司制后,在现实管理中党委集体领导被边缘化,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制度被严重削弱,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名存实亡。

国企高管腐败、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侵吞、贪污、输送、挥霍现象大量发生,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人侵吞国有资产就似探囊取物,如入无人之境。此类现象在过去国企管理制度下是很难发生的,而改制后权力集中、监督落空、无法自束。这说明,从西方照搬的那套服从私人资本利益及其代理人意志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本质上是排斥党的领导和劳动者民主管理权利,不可能自动适应公有财产维护、经营和管理的要求。相反,这种缺乏民主制约



的公司制,一旦与利益集团结合,极易变成一种“公权私用”的制度工具,为财产“化公为私”提供便捷之径。

面对铁的事实,我们应当警醒:国企改革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照搬西方企业制度,不能“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丢了自己长期实践证明是管用的企业制度法宝,应当坚持走自己的路,把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有机纳入国企法人治理制度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改革中有一种倾向,把现代企业制度等同于西方公司制,不提甚至排斥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不同,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削足适履、自废武功,应当树立雄心壮志,在继承中创新,在改革中完善,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用规范、民主、廉洁、高效的形象影响世界,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

民营经济“创新创业”展拳脚

■ 王星

近日,民营经济领域的政策红利,有了数据上的支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非公有制经济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长8.1%,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高1.8个百分点;民间投资上半年增长11.4%,占全部投资比重的65.1%。

整体看,我国经济增长连续两个季度运行在7%,企稳态势比较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4月份5.9%、5月份6.1%到6月份的6.8%,连续3个月回升。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引领下,就业情况好于预期,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就完成了全年目标的71.8%。

然而,正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所言,“新旧动力的转换也在进行之中,新动力还难以对冲传统动力下降的影响”。这也可能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一周时间内三次强调创新创业的原因。

需要注意的是,全国每分钟都有数家新企业诞生,但如何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撑起一片天地,却不那么容易。正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所言,面对风险,不同企业应该有不同对策,创业型企业就应该敢于试错、敢于冒险。而企业到了一定规模,则要用一部分精力探新路,一部分精力用于“把原来碗里的饭吃好”,环境在变,不变就很危险。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一技之长已成为核心竞争力,但职业证书的门槛却一直阻碍着人才的合理流动。也正因为如此,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去年以来已取消149项职业资格的基础上,再取消网络广告经纪人、注册电子贸易师、全国外贸业务员、港口装卸工等62项职业资格,绝大部分领域的从业人员不再会为考证而发愁。创业者也将改变过去通过“借证”申请、维护资质的“奇葩”做法。

此背景下,央企、国企甚至军工集团也在加入创新创业的大潮,共同推动民营经济的健康成长。一批国家层面的资金正通过央企托管入股市场化创投机构的方式投入新兴项目;一向神秘的军工集团,在军民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下,也在“融”字上下足了功夫。

近日开幕的军民融合主题展览,不仅首次展示了“军民转民”、“民参军”的诸多成就,多家军工集团也向民营企业抛出橄榄枝——航天科工集团发起并出资成立的“航天云网”、中航工业推出的“爱创客”,吸引了各类型民营企业的深度参与。对于民企而言,诸多技术难题得到攻克,企业逐渐步入正轨;对于军工企业来说,不仅体现了政治价值、公益价值,也为其未来在民用市场端持续发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一些人们还在关心,GDP究竟应该是7还是其他数字的时候,以“融”的方式开展的创新创业正在发生,民营经济的阵营正在壮大,而后续如何健康持续地推进,相信需要更多层面人士放下思想藩篱,“辞旧迎新”,方能做立时代潮头。

无需过分担忧富人移民

■ 祝乃娟

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国最富裕的人群的移民趋势越来越明显,即利用个人财富将自己和家人移民海外。主要是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实现。另一方面,不少国家正在向中国富翁们敞开大门——条件是他们随身带着钱来移民。

一项关于富人居住地喜好的研究显示,过去14年,离开中国的富翁数量远超过其他国家。

有人据此认为,这种“含金量超高的出走”令其他国家受益。坦白说,这种简单的推理也未必站得住脚,没什么明显证据表明,富人移民一定是“含金量超高的”,即使是“含金量超高的”,也不能证明这些富人移民就明显增强了别国的实力。说一些富人通过投资移民到国外,给当地带来一些就业机会,也有这种情况,但是通过中介所进行的投资移民很多并不是真的去开办实业,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一些富人为了孩子教育移民、购房,的确可能会为外国一些大学增加收入,带动当地的房产销售,但是对移民国的国家实力增强,高难以说完全就是正效应。因此,无需过分夸大与担忧富人移民的趋势。

富人移民通常都有着自己特定的考量,欧美国家的富人也曾出现过一波波的移民潮,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通过种种改革计划对富人增税,这些富人为了避税选择移民国外。现时,中国富人移民大部分是为了子女享受更好的教育,以及对欧美的社会规则更有认同感。当然,也存在一部分“裸官”现象,但是,随着中国反腐工作的强力推进,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贪腐分子被引渡回国。可以预计,这种为了转移和隐匿贪腐资产的“移民”将来还是会属于少数。

虽然富人移民属于一种正常的自由流动,但是这也提示中国在一些规则与制度方面还存在可改进的空间,比如尽快推进教育制度改革、医疗制度改革,再比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应该不断加快。比如近日社会热议的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进养老院事件。显然,在中国社会保障领域内,养老现在很受社会关注,在增加养老院床位,不断满足社会的同时,养老服务也应该提升。相比而言,国外在养老院这各领域发展较早,各种护理服务也较为完善,这方面的差距中国应努力缩小。

当然,中国在这些方面完善制度、推进改革,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为了满足富人的这些需求,改革与制度设计应该本着从全社会各群体出发的考量。一个具有各种公正、有序又有效率的规则的社会,必将是包容性的,既有贫民、中产阶层的一席之地,富人群众也乐于留下来。

食品安全不能只靠内部举报

■ 汪代华

“我们公司冻库内有上千吨‘僵尸’牛肉和鸡爪,没有合法的进货手续……”7月14日上午11时23分,一名自称成都郫县富源泓成物流有限公司员工的张华(化名)向成都商报举报称,自己所在的公司涉嫌存放未经检验检疫的进口牛肉、鸡爪等冷冻品,其中一部分已经开始变质、发臭。昨天下午5时许,郫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接到举报,查获了1万余件、超过200吨的疑似走私肉。(7月15日《成都商报》)

超过200吨的疑似走私“僵尸肉”被内部员工举报出来,被有关部门查获,这是不小的意外收获。近年来有关问题食品被员工反水,被“叛徒内奸”举报出来的新闻不少,我们在为之一高兴地同时也感到一丝忧愁。

人们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来自内部人的举报,能够充分地揭露出企业的违法行为,不仅可以填补政府监管不到位空间,大幅度降低监管成本,对不遵纪守法的企业也可起到震慑作用。有关部门说“一个内奸能顶一个军”。可见“内部举报”的作用不小,难怪有人感叹:一个“内部叛徒”能抵一个监管部门。

食品安全,不仅要依靠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管,也要依靠群众监督,这样才能形成广泛地监管网络,形成无数双眼睛紧盯食品安全的“火眼金睛”筑起一道安全防范屏障。鼓励群众举报,是维护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的补充,相信依靠群众监督必不可少。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那些“黑作坊”等不法企业,生产销售问题食品,也形成了自我“防范能力”,他们会高价收买人心,采取“金钱封口”的办法,来稳住员工,在没有真正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员工都是“在船望船沉”,不会轻易去自揭家丑,砸自己饭碗,再说,内部举报有风险,员工担心:“揭发行为是自揭家丑,是组织的叛徒,在行业内没法混了”。在一些人的观念里告发者就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很难有立足之地。

当然,我们一方面要依靠群众监督,鼓励举报,尤其是内部举报,但维护食品安全,也不能只是依靠“内部叛徒”的力量,有关部门应该积极作为,必须保持监管的独立性,主动出击,要从审批、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严格把关,切实建立以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为标准的行业准入机制,从源头上杜绝不安全的食品入市。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可以预计,让更多百姓吃上更加安全放心的食品。

打通瓶颈 快递业才能持续奔跑

■ 郭振纲

快递业遇到的多是“成长中的烦恼”,就像其他新兴行业一样。让快递业做大做强,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力,快递业大有发展空间。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合理监管,打通快递业发展的瓶颈,补齐“短板”,快递业才能良性发展,持久红火下去。

据《新华每日电讯》7月19日报道,低价竞争、快递车辆违规上路、快件安全存隐患……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我国的快递业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焦点问题不容回避。据业内统计,快递单价近年来不断下降,2005年平均单价为27.7元,到2014年只有14.7元。在劳动力、油品等快递成本要素上涨的情况下,这种低水平的扩张难以维持。有人因此发出疑问:中国快递业还能火多久?

快递业还能火多久?这个问题不仅业内人士关心,社会各界也在关注。作为一个发展时间不长的新经济业态,快递业经历了“井喷式”的发展,快递已然成为诸多领域必不可少的物流中介,“快递哥”给大江南北各个角落的人们送去各色商品或信件等。

但是红火景象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令人担忧的因素。比如,规模参差不齐,从几个人的快递公司到拥有飞机的大企业,应有尽有;从业人员良莠不齐,违规和侵害客户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行业大而不强,不少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些问题已经影响到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是什么因素左右着快递业的发展? “以价换量”虽然扩大了快递业的行业规模,中国快递获得了业务量世界第一的名分,但却牺牲了经济效益,一些小快递公司长期游走于亏损边缘,“井喷式”发展呈现出一种表面的繁荣,多数快递公司局限于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地区,具备全国网络的企业不到1%。业务重复、恶性竞争在所难免;多数快递公司给一些电商“打工”的状态,从一个层面显示出快递公司的议价能力弱,电商指定快递公司的潜规则,让多数快递公司失去了说“不”的底气;行业缺乏标准,什么时候送到,采用什么样的服务标准,一个公司一个样;监管不到位,一些快递公司损害消费者利益、诚信

堪忧,等等。

快递业是现代物流不可缺少的一环,让快递业做大做强,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力,应该说,快递业大有发展空间。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合理监管,打通快递业发展的瓶颈,补齐“短板”,快递业才能良性发展,持久红火下去。

其一,快递业应建立统一、覆盖全行业、具有强制力的行业标准,提升服务质量,避免恶性竞争,推进行业整合,从而打造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国际化大物流企业。

其二,尽快理顺制约快递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如快递车辆的合法性问题、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人才缺乏、家族化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快递业就不可能上台阶,现代物流的经营理念就难以实现。

其三,快递行业的保险和赔偿机制应尽快提上日程。目前,消费者对快递业的投诉率比较高,延误、丢失、损毁快件是消费者申诉的突出问题。一些快递企业很少进行保价,有些快递员甚至偷窃快递物品,由此发生的法律纠纷日趋增多,需要尽快建立健全快递行业的保险和赔偿机制。

快递业遇到的多是“成长中的烦恼”,就像其他新兴行业一样。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大背景下,快递业注定会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互联网经济时代 更需有形之手

■ 雷海超

近日媒体报道,媒体记者通过对北京朝阳、大兴等区县以及河北燕郊、保定等地走访发现,大量仿真度高、价格低廉的假冒日用品充斥市场。被仿冒的日用品包括洗发水、蚊香、卫生纸等,大部分由黑作坊生产并通过网络论坛、QQ群等途径销售。经专业机构检测,购买的多种“高仿”洗发水均有重金属检出,一款“高仿”洗洁精含量超标58倍。

互联网经济时代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但也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就如此次“高仿”日用品泛滥事情中,互联网就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大量“高仿”日用品生产者以黑作坊为主,主要通过网络寻找买家,然后以物流的方式运送货物。与其他网购模式一样,互联网社交平台和现代物流是整个销售环节的重点,正是依靠这两项使得“高仿”日用品销售范围打破区域限制。互联网和现代物流成为了“高仿”日用品泛滥的“帮凶”,不仅拓展“高仿”日用品的销售渠道和范围,更让其生产和销售活动更为隐秘,给打假增加困难。互联网就是一个工具,用之于正则正,用之于邪则邪,因此,互联网时代更需有形之手。

互联网就是一个工具,与人类发展中所创造的各种工具一样,其本身并不会选择使用者,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互联网能够成为诚实守信企业发展的助力,也能够成为那些心生邪念的人们“发财”的利器,就如市场失灵时需要有形之手一样,互联网发展也需要有形之手管控。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既需要互联网不断提供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机遇,也要用有形之手加以规范,通过制定规则确保互联网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不是破坏市场规则的“帮凶”。

互联网的开放性对有形之手提出了更高要求。互联网是虚拟的,但却在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形之手要想在互联网管控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与时俱进,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实体经济调控那套搬到互联网上肯定会栽大跟头。就以此此次“高仿”日用品事情为例,生产者和销售者通过网络论坛、QQ群等途径联系,一些生产者甚至于没有工商执照藏身暗处,“地下销售网”的隐秘使其难以被执法部门发现,互联网的开放性和隐秘性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有形之手来说,要想打掉这个“黑产业链”,也需要借助互联网,通过建立大数据平台,对群众举报进行分析,根据分析报告采取行动。当我们在感叹“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的时候,不妨也考虑他们在互联网中依然能够发挥巨大作用,让互联网中的不法分子没有安身之处。

互联网能够创造无限可能,但也要保障互联网不成为不法分子的武器,有形之手要加大对互联网违法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这样才能震慑不法分子,让守法企业获得遵守制度的红利,从而形成互联网生态的良性发展。

